

中、印、尼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影响

——来自三国学者的观点

李 涛 项晓莹 罗 魁

摘要：中国学界过去对印度佛教研究较多，对尼泊尔佛教研究不多；对中印、中尼佛教交流研究较多，而对中、印、尼三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则不多。2019年11月25日，由中国友谊促进会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加强佛教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融相通——中印尼佛教文化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印度德里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新那烂陀佛教大学、加尔各答城市学院和尼泊尔的特里布文大学、莲花学院、蓝毗尼佛教大学以及中国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上海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三个国家18个单位的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围绕中、印、尼三国“佛教源流与影响”、“佛教传承与艺术”以及“佛教融合与发展”三个议题展开交流，讨论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为三国的友好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三国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印、尼佛教交流的历史起源、特点、影响、问题和建

议五个方面。

关键词：中印尼三国佛教；佛教文化；交流特点；佛教影响；存在问题；发展建议

收稿日期：2020-03-02

作者简介：李涛（1966~），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南亚宗教与社会、中国—南亚关系；项晓莹（1996~），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2018级硕士研究生；罗魁（1996~），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2019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喜马拉雅合作研究”（项目编号：17JJDGJW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中、印、尼佛教交流的历史起源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则诞生于今尼泊尔境内

的蓝毗尼。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从此开启了中印、中尼佛教文化交流的辉煌时期。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鹏谈到，1600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赴印度、尼泊尔学经，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到中国传播佛教。唐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高僧玄奘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元代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率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宏伟建筑。这些友好交流的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代相知相亲、携手前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何平教授从地域视角出发，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成都的保护和发展。他谈到，佛教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国。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四川后被广泛接受，成都更是出现了强烈的宗教崇拜。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四川是印度僧人从西域经甘肃、康藏，再到四川，前往中原的通道。成都佛教活动的鼎盛时期，寺庙众多、规模宏大、名声显赫，在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都是早期佛教徒在洞穴修行时创建的，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石窟文化。我们的用语中现存很多词汇都来自佛教，如“无限”、“无常”等。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融合使得中华文化艺术更加多元绚丽。

中国和尼泊尔通过交流互访、僧侣往来、佛经翻译、商贾贸易，使双方关系得了到持续的巩固和发展。尼泊尔莲花学院佛教研究系讲师桑杰·释迦（Sanjay Shakya）指出，早在公元5世纪，佛陀跋陀罗就受邀来到长安，他与中国高僧合力或独立翻译了《六十华严》等多部经书，并最终圆寂于中国。据唐朝史料记载，在唐代，中国派遣使者三人尼泊尔访问。尼泊尔学者、梵学家、建筑家、画家等也纷纷来到西藏宣传佛教、装饰佛教寺院。公元7世纪中叶有一条从中国经西藏和尼泊尔到印度的捷径，称为“唐尼古道”。公元10世纪中国曾有300多名僧侣访问尼泊尔。《青史》《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等著作都记录了西藏地区与尼泊尔之间的积极交流。西藏学者来到加德满都山谷，寻找经文、密宗、语言教学和朝圣等。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贾斯瓦尔·普拉默德（Jaiswal Pramod）研究员也谈到中尼两国佛教的汇聚情况。公元641年左右，佛教传入西藏。藏王松赞干布通过军事征服统一西藏，并迎娶了两位佛教公主——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把佛教带入西藏。尺尊公主以佛像和佛教手稿作为嫁妆，并指派随行的一个佛教学者在西藏传播佛教。公元11世纪，精通三重瑜伽哲学、逻辑和密宗的佛教学者阿底峡到西藏传播佛教，由此佛教在西藏地区迎来了后弘期。特里布文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特里·拉特纳·纳拉扬·马诺哈尔（Tri Ratna Narayan Manandhar）和法学院副教授甘内什·巴塔（Ganesh Datta Bhatta）谈到了尼泊尔和西藏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渊

源。在17世纪，通过一项商业协议，尼泊尔商人被允许以特权商人的身份在拉萨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在拉萨，几乎所有的尼泊尔商人都是尼瓦尔人，他们还与当地藏族人民通婚，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奉行藏传佛教仪式并将藏传佛教带入尼泊尔。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中尼关系更加紧密。西藏僧侣到尼泊尔学习佛教，尼泊尔僧人到西藏地区弘法，更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佛教高僧，使得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尼泊尔的能工巧匠、佛教学者也为西藏的佛教艺术做出了贡献。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有许多关于印度与中国佛教界高僧交往、交流、传播佛教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记载。印度新那烂陀佛教大学教授阿伦·库马尔（Arun Kumar）讲述了中国僧人在印度求法的故事。历史上总共约有30名中国僧人来到印度求法，法显和玄奘的名字如今更是在印度家喻户晓。法显是有史实记载的第一位到访印度的中国僧人，他回到中国后撰写了游记以及几本佛教书籍。玄奘是第二位到访印度的中国僧人，他所撰写的游记记载了印度所有重要的佛教圣地。义净是第三个到访印度的中国僧人。上海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朗荣吉（Ranjan Rajiv）介绍到，中印两个文明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印度两本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都多次提到中国。孔雀王朝时期著名政治家考底利耶的著作《安邦治国术》和据传梵天之子摩奴一世所写的《摩奴法典》中也提到了中国。加尔各答城市学院政治科学系的助理教授阿迪蒂亚·吉辛（Aditya Ghising）介绍了锡金邦的佛教信仰情况。锡金邦位于印度的东北部，在该邦有24%的人信奉佛教，锡金的佛教主要是宁玛教派，佛教密宗对锡金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锡金佛教不论是信仰仪式还是寺庙结构，都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佛教文化已成为跨喜马拉雅地区文化纽带的组成部分。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尹锡南教授介绍了印度佛教学者师觉月的“中印共同文明论”。1927年，师觉月关于中国汉译佛经的两卷本法语博士论文《中国佛教藏经：译者与译文》出版，这可被视为现代印度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正式开端。师觉月的另一部代表作《印中千年文化关系》的初稿同年首次发表于《大印度学会》。《印中千年文化关系》主要涉及以佛教为沟通媒介的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具体涉及中印古代物质交流、人员往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概况、印度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与中印文明的共同点和差异处等重要方面。师觉月利用丰富的中文和梵文资料，围绕佛教这条文化“红线”，对中印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梳理。这本书使印度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站在一个理想的起点上，其中有些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二、中、印、尼佛教交流的特点

（一）佛教是“一带一路”所涉及区域范围内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之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廉湘民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的佛教信仰情况。中国目前约有佛教教职人员22.2万人，佛教寺院约3.35万座，其中汉传佛教2.8万余座，藏传佛教3800余座，南传佛教1700余座。截至2017年9月，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设立的佛教院校41所。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7处，住寺僧尼4.6万多人。西藏自治区和7个地市均设有佛教协会，中国佛协西藏分会亦有西藏佛学院、藏经文印经院和藏文会刊《西藏佛教》。西藏寺庙的传统印经院得到保留和发展，现有布达拉宫印经院等传统印经院60家，年印经卷6.3万种。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万果教授认为，整个“一带一路”所涉区域当中，存在一个典型且突出的佛教文化带。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传承至今包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等诸多派别，均属于佛教文化体系。在南亚诸国当中：尼泊尔在历史上曾为佛教徒朝圣的中心，目前尼泊尔的佛教信仰以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为主；不丹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具有悠久的佛教信仰传统，并且印度文化当中存在大量的佛教文化内容；斯里兰卡的信仰主要为南传佛教。此外，“一带一路”范围的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佛教信仰传统，佛教文化气息浓厚。这一佛教文化带以环喜马拉雅地区为核心，主要包括整个南亚、部分东南亚、中国西藏及其他四省藏区。

（二）僧伽队伍扮演着国家间交流大使的角色

刘鹏指出，前弘期佛教通过高原丝绸之路传入吐蕃，本土僧才应运而生。松赞干布迎请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的僧人传法译经，派吞米·桑布扎赴印度求学取经，创制藏文，译经，为吐蕃本土僧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赤松德赞在主政时期迎请寂护、莲花生大师主持建造西藏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派遣7位上层贵族子弟出家为僧并前往印度学习佛经；设立了最早的佛学院——妙法学院。阿底峡尊者于1040年踏上漫漫高原丝绸之路，1041年至尼泊尔，1042年至西藏阿里地区，在藏传教前后共计14年之久。正是他的到来，佛教在西藏迎来后弘期，并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也形成了各类教派。元代有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明代有三世噶玛巴让迥多杰，清代有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他们都是沿着高原丝绸之路到达北京，与中央王朝建立了关系。近代有喜饶嘉措大师借道印度经由海路赴南京。这些代表性的人物，都是“一带一路”上的文明使者，他们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承发展，深化了中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搭建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阿伦·库玛尔（Arun Kumar）教授强调了僧侣在加强中印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联结就始

于两位佛教僧人。历史上共有150名印度僧人来到中国，这些印僧长期居住在中国弘法并撰写书籍，加强了中印关系。中国现存的第一本佛教书籍是由两个印度僧人所写的。现今印度找到的重要佛教圣地都是根据法显和玄奘所撰写的中文文献发掘的，他们的名字如今还刻在鹿野苑、库希那加、舍卫城、那烂陀寺等著名佛教圣地的石碑上。中国和印度僧人的名字深深地植根于印度和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难以泯灭。

（三）佛教艺术是中、印、尼三国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载体

佛教艺术随佛教的诞生而产生，其主要构成形式为寺院艺术和石窟艺术。元代来自尼泊尔的匠人阿尼哥在中国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等多座寺庙，佛塔和佛像成为中尼文化交流的标志性文物。元明时期是西藏宗教艺术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外部影响和自身发展整合转化的关键历史节点。在众多外来艺术中，对西藏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尼瓦尔族为代表的尼泊尔式艺术，当地的藏族佛像也被称为“尼赞风格”。蓝毗尼佛教大学佛教艺术博士那里什·释迦（Naresh Shakya）以夏鲁寺院内的壁画作品为例，讲述了中尼印佛教艺术的交流。夏鲁寺位于日喀则地区雅鲁藏布江和年楚河交汇的地方，公元11世纪初，西藏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此地领主喜饶迥乃在此建立了夏鲁寺。后在元朝政府的统治和支持下，当时西藏最杰出的佛教大师布顿·仁钦珠带着汉地工匠和艺术家主持了夏鲁寺的修缮工作。夏鲁寺壁画的构图、人物造型、传统的诸佛菩萨尊像的仪轨上都深受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的影响。如寺庙底层大殿转经甬道的回廊里留有精美的尼泊尔壁画，这些壁画无论从人物衣着还是面相都表现出典型的尼泊尔艺术风格。而在一层转经道所描绘的释迦牟尼本生故事中，人物服饰、山水描绘、般若佛母转经壁画的一些细节都强烈地反映了汉族的绘画风格。夏鲁寺壁画代表了中国、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伟大融合。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李翎教授介绍了西藏雪域保护神十一面观音和印度湿婆形象的关系。根据《西藏王统记》史料记载，藏王松赞干布创建了吐蕃王朝，迁都吉雪卧塘（拉萨），便准备在以拉萨为核心的卫藏地区大力弘扬佛法，但此时他身边却没有一位作为修持依怙的本尊。于是，松赞干布便请一位比丘去寻找他的本尊神。如今在布达拉宫的圣观音殿里供奉的一座自然天成的檀香木自在观世音像以及在南印度（今斯里兰卡）和北印度（今克什米尔地区）找到的十一面观音即为松赞干布的本尊神。在西藏地区盛行的十一面观音被称作雪域保护神，而在印度传说中，湿婆是雪山之主，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吉婆婆山（今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钦神山）修炼苦行。观音名号最早在《阿弥陀经》中被提及，印度僧人耶舍崛多所译的《十一面观音神咒经》、阿地瞿多译著的《陀罗尼集经》和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中都有关于十一面观音的记录和描述。

法显赴印求法回国后，观音像开始在汉地大量出现。水月观音是汉地于五代、宋流行的一种观音样式。从这些大量的实物上看，水月观音的样式大多以手抚膝、半跏趺坐，或手持杨枝和净瓶、半跏趺坐（或全跏趺坐）。李翎学者认为这种散漫姿态正是来源于湿婆形象的影响。众所周知，观世音被称“世间自在”，“观自在”。而湿婆则被称“大自在”。玄奘大师来到南印度，既现在的马杜赖一带时，提到一个现象：“国南滨海，有秣刺耶山……秣刺耶山东有布咀洛迦山……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从7世纪玄奘大师等译出十一面观音经，到观音的名号、身形样式，都可以看到十一面观音与湿婆信仰在中国（尤其是藏区）的强烈影响。石窟是佛教艺术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最早作为佛教徒修行、生活和做佛事活动之地。佛教石窟诞生于印度，随着佛教传入西域，石窟寺艺术也随之传入。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路线与佛教石窟的开凿与分布，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印度的阿旃陀，到中国新疆的拜城、库车，甘肃的敦煌，山西大同的云冈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等地，联结成一条辉煌的佛教石窟寺艺术锦带，并逐渐形成独特的中国石窟文化。三国在佛教艺术互学互鉴的方面还有许多，应尽力挖掘这些共通的思想和文化艺术，学习古人的智慧，用文化纽带建构认同。

（四）佛教通过“一带一路”传播，并反哺“一带一路”发展

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四川大学印度学博士张晓（Jitendra Maurya）谈到，公元2~5世纪，丝绸之路横跨欧亚，使得亚洲文化、宗教、哲学等得以传播。途径国家互学互利，为促进人类文明、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他认为丝绸之路将中印两国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资料显示，中印文化交流从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开始并在唐代达到鼎盛。印度佛教传至东土后又到达日本，大乘佛教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佛教思想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使得当今社会能进一步传播大乘佛教。玄奘高僧远赴印度求取佛经并翻译经文期间，穿梭在沙漠的骆驼运输商队通过一系列的丝路贸易也在促进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中印双方对话的途径，是一种完美致敬。它连接了亚欧贸易，也联系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情感。德里大学哲学系主任哈里·尚卡尔·普拉萨德（Hari Shankar Prasad）教授指出商业贸易路线会对宗教发展发挥作用，宗教传播同样反哺贸易发展。由于佛教信徒对宗教用品的渴求，使其成为重要货品，自有商人千里迢迢贩运。而沿途的寺院，为商人提供了补给点。商人则是寺院的主要赞助人，他们需要得到的是精神慰藉。佛教文化也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四川国际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董峰指出，藏

区宗教文化已成为藏区旅游观光的重要内容。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文化精品遗迹，如寺庙、灵塔、宗教绘画艺术、祭祀祈福遗址场所等，这些已经成为目前藏区旅游的重要资源。藏区宗教寺庙开展旅游经济活动情况更加普遍，派出许多宗教文化的旅游纪念品。从现在内地许多艺术文化作品包括绘画作品中都能看到藏区宗教文化的元素，许多非信教群众通过到藏区旅游，对藏传佛教内容都有了一些深浅不一的了解。藏区宗教文化旅游给藏区民众，特别是给宗教文化场所带来了可观收入。旅游收入的增加，使许多宗教文化旅游场所在寺庙维修改造，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僧侣住房，改善环保供水设备等方面变化较大。“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和商业丝绸之路，而且是一条佛学文化教育传播之路，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交流及商业往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已经逐渐消亡，但唯有佛教及佛教文化依然屹立千年不倒，并反哺“一带一路”。

三、中印尼佛教的主要影响

（一）佛教对人的影响

哈里·尚卡尔·普拉萨德（Hari Shankar Prasad）教授分享了佛陀乔达摩·悉达多讲经的故事。佛陀在讲经过程中使用莲花这一种水生植物为例，虽然莲花的根在淤泥中，但是莲花本身是非常鲜艳的，用这样的方式来阐释真理和人的关系。佛陀讲经体现出他对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并通过这样的比喻使他讲述的内容越来越透明，一般的大众就更容易理解，佛教思想也更容易被传达出去。理解佛教思想和精神是一个自我沉淀的过程，佛教思想转化了人在精神、生理、声音这三种层面的行为，尤其是道德行为。基于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是佛陀，都是觉悟者。所有人都必须遵守道德原则，然后用道德原则来指导行动。佛教的作用就是帮助人类管理自己，“佛陀不会把你背在肩膀上帮你渡河，他要你自己去渡河。”特里·拉特纳·纳拉扬·马诺哈尔（Tri Ratna Narayan Manandhar）教授认为，道德文化（Sila）、精神文化（Samadhi）和精神智慧（Pragya）是佛教生活的基本内容。道德文化的最低期望是遵守“潘查希拉”（panchasilā，即佛教术语“五戒”）；精神文化是一个净化和提升自己意识的过程；最高期望则是通过精神智慧获得，一个人通过精神智慧、自我控制和自我修养，将能帮助穷人和无能者并最终成佛。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巴利语与佛教研究系主任比马伦德拉·库马尔（Bimalendra Kumar）谈到了佛教道德戒律对佛教徒的影响。佛教道德戒律是理性的，它鼓励思考和讨论，而不是毫无疑问地接受传统。道德戒律（patipatti）和教义（pariyatti）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两个基本方

面。道德戒律是根基，佛学是基础。修行是佛教的重要方面，也是正身圆满的途径。在慈戒修行过程中，佛教教义内化为社会的道德标准并以此提升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二）佛教对世界的影响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欧东明教授认为，佛教的非暴力思想可以构建全球基本伦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便没有人类的和平；而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既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也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规范中，标举出了所有人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基督的“爱人如己”和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相互补充的基本道德原则，这就是关于所谓“道德金律”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表述。而佛教的非暴力原则，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诉诸于无常和偶然的情绪和情感，而是见之于佛教经典里的著名的慈悲双用的这样一种运动中。佛教的非暴力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实质性内容，也带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它同时满足了道德伦理所需要的必然性和情感的自发性。在欧东明教授看来，佛教的非暴力思想是具有充实内容的行为规范，它正好可与上述的两个“道德金律”表述相互补充，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使得“全球伦理”的主张变得更加坚实、完备和具体。和平主义是佛教思想的最大特征，佛教的和平思想不仅以和平为目的，其追求途径本质就是和平。特里·拉特纳·纳拉扬·马诺哈尔（Tri Ratna Narayan Manandhar）教授提到，佛陀想象了一个基于爱、慈悲和宽容的社会，并将和谐的社会生活放在首位。佛陀关于和谐社会的概念不仅限于人类，还包括所有生物——鸟类、动物和其他低等生物。由于缺乏知识，鸟类和动物为了生存不得不经常发生冲突，佛陀认为人类有责任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其他生物和环境。特里布文大学历史教授山卡·塔帕（Shanker Thapa）介绍了解决冲突的佛教模式。根据佛陀的定义，冲突是人类因为执念而造成的，世间万物由于不同的理念和执念造成了不同的立场，所以产生了一些冲突。佛陀对争议的原因归结了六条，称为六争根。佛教提出七种方式消除争议产生的根源，例如通过其他方的介入、通过各种方式在争议情景下找到解决和灭除争议的办法。在国际关系中，这些方法和模式也是可以借鉴的。佛教的和平慈悲、非暴力等基本思想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佛教对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影响

佛教文化的传播深化了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融，也搭建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万果教授谈到，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突出的影响力在整个“一带一路”范围尤其是南亚区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南亚地区是佛教的发源地，民间佛教信仰的传统历史悠久，佛教文化深深根植于南亚地区文化当中。在南亚各国的民间，普遍体现出对藏传佛教文化具有相当深度的文化认同，并且对藏传佛教文化具有十分强烈的理解和主动接受意愿。西藏阿里的神山冈仁波齐、圣湖玛旁雍措等，每年都会有来自印度、尼泊尔等众多国家的佛教信徒前来朝拜。藏传佛教作为佛教文化体系中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及成熟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民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文化纽带。另外，藏传佛教典籍文本的发掘与翻译和藏传佛教的传播催生了学者学习藏文、研究藏传佛教义理和思想观念的需求，也导致中国藏地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宗教、文化受到的关注明显提升。桑杰·释迦（Sanjay Shakya）学者认为，尼泊尔的历史是支离破碎的，汉语和藏语文本为尼泊尔历史学家提供了大量信息并帮助还原尼泊尔完整的历史。他还认为传统的丝绸之路帮助佛教从南亚传播到中国、中亚和东南亚，沿途许多佛教圣地和石窟都有尼瓦尔佛教艺术遗产的痕迹，进一步的研究将加强国家间的联系。佛教在中国和南亚地区撒下了和平的种子，促进了双方交流互鉴，增进了人民的深厚情谊。

四、佛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它在传播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世俗化的侵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宗教面临的世俗化问题更加突出

佛教寺庙的趋利化和佛教僧众的庸俗化使中国佛教广受非议。廉湘民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佛教面临的世俗化问题主要体现在宗教商业化方面。随着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协会恢复，各地出现了修复、重建寺庙热，出家热，出版印刷佛经热，佛教文化传播热等。在内地各省为主的五大宗教并存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宗教发展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尤其是随着地下宗教势力的流传，传统宗教迅速走上了快速世俗化的道路，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厚。西北、西南一些民族自治地方为代表的传统的相对单一宗教地区，传统宗教因素迅速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神圣化色彩日益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宗教极端化的现象。在以西藏和四省藏区为代表的广大藏传佛教传播地区，既存在商业化的冲击，也存在个别宗教极端主义现象。一些地方的寺庙规模越来越大，金碧辉煌，活佛、堪布等追求奢侈的现代物质生活，热衷于进入商业圈，寺庙利用超经济优势经营企业，垄断地方重要收入来源，与地方群众争夺利益。个别地方的佛教组织和人士不仅介入地方社会事务，甚至干预司法，干扰行政，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使职权。佛教商业化是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宗教世俗化的必然过程，是资本进入宗教领域和宗教组织与宗教职业人士逐利的双重结果，对保持佛教神圣性

造成严重的影响，是佛教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问题。

（二）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传播过程中的异质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

以藏传佛教为例，万果教授谈到藏传佛教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因观念、文化土壤等差异而造成的误读或曲解，甚至一些基于想象的断章取义，正是世俗世界出于自身视野对宗教的偏差化解读。在南亚地区，藏传佛教的异质化则有其特殊性。因为藏传佛教与南亚地区在历史上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难免有别有用心者，对这种历史渊源进行恶意的曲解和利用，从而服务于其分裂中国、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的阴谋。无论是一般异质化中的表现（包括信仰对象盲目、信仰动机的表层化以及信仰心态的趋于功利，亦有一些诸如宗教身份门槛降低、管理松散、冒充宗教人士等行为），还是这种对历史曲解利用企图以藏传佛教作伪装进行分裂西藏、制造民族冲突等阴谋活动的特殊异质化，都应当加以重视，予以警惕。

（三）在中印互信缺失的背景下“佛教外交”恐成两国软实力竞争的新战场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戴永红教授将社会心理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运用于中印关系的实践中予以考查，认为中印两国目前仍缺乏互信。他以2009年印度环境与森林部长批评中国，《今日印度》杂志污蔑中巴关系，印度电影《帕尔坦》是一部“抗中神剧”，印度民众游行反对中国商品倾销等行为为例，说明中印在不同层面都缺乏互信。从政治家层面来说，一些政客不希望解决中印矛盾以期谋利；在媒体层面，需要的是抓眼球的大新闻而不论真实性和可靠性；民间也缺乏互动互信导致中印人民互相不认可。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伍福佐博士探讨了佛教对21世纪中印关系的意义。她认为，宗教只是中印关系的一个小方面，其影响力占比有所降低。中国和印度都是世俗国家，因此宗教很难在两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印在南亚地区以及印度洋周边进行战略博弈，现实角度是中印关系的更大考量。伍福佐博士由此认为佛教是21世纪中印关系的一个次要因素，但可在外交中发挥双轨作用。在佛教中嵌入的个人行为规则，如忍受、耐心、非暴力，对于两国解决边界争端等问题都是有益的。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国和印度，都开始将佛教作为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重点之一。目前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依托佛教作为文化软实力与亚洲各国发展良好关系。而莫迪政府也大打“佛教牌”与亚洲国际建立佛教联系。贾斯瓦尔·普拉默德（Jaiswal Pramod）研究员认为，中国和印度正通过国际会议、组织和文化之旅，试图利用与佛教的历史联系获得软实力。在2005年世界佛教论坛上，中国提出要建立一个佛教徒交流合作的平台。中国正通过佛教增加在尼泊尔的影响力，对佛陀诞生地蓝毗尼（位于尼印边界）的兴趣也在增加。目前印度政府已将佛教外交

作为一个有效工具，通过创建国际佛教组织等多边机制来强化佛教外交，强化印度的地区认同感。自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印度一直视自己为藏传佛教的保护者。印度希望通过争夺佛教话语解释权，向西藏渗透并形成遏制中国的屏障。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彼此佛教外交的对象，就目前印度的态度来看，可以预料的是，中印两国同时开展的佛教外交可能更偏向的是一种对抗走势。

五、推动中、印、尼三国佛教发展的建议

山卡·塔帕（Shanker Thapa）教授认为，地缘因素只是中、印、尼关系的一个考量，文化因素才是内生动力。学者们应该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中尼印佛教信众，围绕佛教汇聚点建立纽带并找到三国关系的契合点。中尼印三国存在诸多问题，应通过寻找共同点来解决分歧，努力思考佛教对三方关系的意义。鉴于历史上僧侣在加强中国与南亚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刘鹏建议要培养更多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僧才，建立“佛教与‘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常态交流机制，提升学僧国际间人文交流能力。“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在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和谐发展过程中，中国佛教人士及友好团体亦可以为此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沟通平台。此外，还应加强各国佛学院交流学习，力促佛教教育国际化，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借鉴域外文明。

万果教授认为，藏传佛教因其与古印度佛教的渊源、在环喜马拉雅地区乃至整个南亚地区所具有的民间信仰传统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整个佛教文化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综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佛教文化的核心在环喜马拉雅文化圈一带，而中国西藏及四省藏区是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文化传播高地，当代佛教更是体现出寻根溯源、融合互鉴的最新发展趋势。从现实需要来说，无论是中印边界争端解决，还是从“一带一路”建设或南亚通道建设，都需要深入研究南亚地区藏传佛教传播问题，藏传佛教应当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沟通与对话的桥梁。藏传佛教文化传播亦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探寻切实可行之道，特别是为“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另外，藏传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异质化，及伴随异质化而生出的种种问题，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所伴随最为显著的挑战。万果教授认为要坚持正确的宗教政策、明确辨析宗教义理，从而使藏传佛教文化表达得以规范化。

廉湘民研究员认为，佛教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解决好佛教商业化的问题，否则佛教将在世俗化过程中彻底丢弃宗教的神圣性，否则佛教组织就会成为赢利性商业组织，佛教职业人士成为商人，给佛教带来致命的伤害。政府已经意识到佛教商业化的危害，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但要彻底解决佛

教商业化问题还有待全体佛教界人士主动放弃逐利动机，也需要广大信众的坚决抵制和全社会对清除佛教商业化的支持与配合。世俗并不等同于庸俗，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理论创新、贴近世俗、回归人间，同时对佛教场所及僧侣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僧众及整个僧团的素质建设。

民心相通是双边关系的最完美状态，应该努力促进中印民间的交往。朗荣吉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国家之间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事实上，全球化和国际多边区域性组织和平台的建立旨在加快这种互动。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人文交流。各国应以人文交流为基础，并继续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文明通过互相适应对方的品质而相互补充，并在共同生活中共同繁荣。作为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建设共同的未来。戴永红教授认为，中印两国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来建立“战略互信”。在宏观层面从四个角度入手：首先，政府要积极引导，要鼓励“积极期许”对国家关系的贡献。其次，要屏蔽西方杂音，避免某些“消极期许”对两国关系的破坏。再者，要扩大人员交流，只有加深彼此了解，才能引领积极的社会效应。最后，要鼓励文明开放，建立一个包容、开明的高信任度社会。在微观层面也要从四个角度入手：首先，消除“低信任者”消极影响，建立“信任社会”；其次，媒体不可唯利是图，要承担社会责任；再次，鼓励中印文化、人员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最后屏蔽第三方因素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哈里·尚卡尔·普拉萨德（Hari Shankar Prasad）教授谈到，艺术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和精神的投射，代表一种相互交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历史上中国与南亚国家通过佛教艺术交流实现了伟大的融合，未来佛教艺术也能在促进中尼印文化融合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贾斯瓦尔·普拉默德（Jaiswal Pramod）研究员认为，未来要加强文化交流活动，共同进行佛教遗产的开发、保护和管理的工作，大力发展佛教旅游事业，实现各国佛教旅游景点的连接，鼓励佛教巡游和朝圣活动的进行。

尹锡南教授建议，除了以佛教加强中国与南亚研究外，还需要增强佛教文化以外的交流。加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印度教文化交流，还有伊斯兰教、锡克教等交流途径。中国在佛教机构建设中要有意识地增加与印度、尼泊尔等国佛教交流原始历程中的实物展示，以此拉近中国与尼泊尔、印度的佛教联系。还应注重中尼、中印、尼印的双向翻译工程，确保佛教翻译的语言表述、思维模式能被异国民众理解、接受，从而加强佛教交流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责任编辑：孙喜勤]